

关于辽沈、平津战役中 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问题

(仅供内部参考)

北京市纺织工业局政治部翻印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九日

关于辽沈战役中 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问题

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表现在各个方面，特别是林彪一九五九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更加完备了，影响和危害也更大了。我们今天介绍的只是在辽沈战役中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一些情况。

下面分成四个问题向同志们作介绍：

- 一、辽沈战役的地位和作用；
- 二、辽沈战役前全国和东北的战略形势；
- 三、辽沈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主要问题（这是今天介绍的重点）；
- 四、林彪在辽沈战役中错误路线的历史根源。

一、辽沈战役的地位和作用

介绍这个问题，想帮助首长和同志们进一步了解林彪这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当时给战争造成了一些什么危害，进一步了解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战胜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才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才促进了整个战局的迅速发展。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三大战役（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构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战略决战阶段，全部歼灭了国民党的军队一百五十多万人。

人。辽沈战役是这三个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的先头部队到达北宁线开始（北宁线即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线），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结束，前后历时五十二天，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九月十二日开始，到十月十八日结束，我军攻克锦州，解放长春，消灭敌人两个兵团，二十多万人，俘虏了在锦州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在长春的“东北剿总”另一个副总司令郑洞国投降。第二阶段从十月十九日开始，到十月二十八日结束，我军在辽宁省西部的黑山、大虎山地区消灭了敌人一个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约十万人。第三阶段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到十一月二日结束，我军占领了沈阳、营口，消灭敌人将近十五万人。整个战役共歼灭敌人一个“总部”，即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即第一、第六、第八、第九兵团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六个正规师，另九个非正规师，全部约四十七万人。

在辽沈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到十月间，在其它各个战场上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在山东战场上，打了津浦路中段战役和济南战役；在中原战场上打了豫东战役和襄樊战役；在华北战场上打了晋中战役；在西北战场上打了澄邵战役，等等。这些战役，连同辽沈战役在内，我们在七月到十月的四个月内，消灭了敌人一百万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关于军事形势的这一转变，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作了精辟的论述。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说：由于我军在四个月中歼灭了敌人一百万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

当时，我军的总兵力已增加到三百万人以上，而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则

已下降到二百九十万。毛主席说，这样一个变化，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毛主席还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毛主席原来预计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大体上要打五年，就是说打到一九五一年，可以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在经过一九四八年七月到十月的四个月作战消灭了敌人一百万人以后，毛主席讲：“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也就是说，距离毛主席写这篇文章不到一年的时间，战争进程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英明预见发展的。主席这篇文章充分说明了辽沈战役在当时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我们充分地、正确地估价辽沈战役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林彪这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当时对战役的干扰和破坏，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林彪反党集团为什么拼命鼓吹林彪在这个战役中的作用。在辽沈战役中，如果不战胜林彪这条军事路线，不排除林彪的干扰、破坏，战争的进程将会延长，而不是缩短。所以，同志们学习这两份材料和批判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的时候，我们建议把毛主席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这篇文章，也作为学习的一个重要文件。

二、辽沈战役前全国和东北的战略形势

首先说全国形势。解放战争正式开始，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这个时候国民党开始围攻我们中原解放区。我们是以这个作为解放战争正式开始的时间的。从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底，到一九四八年的六月底，经过两年作战，我们在毛主席英明领导和亲自指挥下，消灭敌人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虏敌人一百六十三万人。这样就打出

了一个很好的形势。这个很好的形势，主要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这三个方面来看。

从经济形势来看，解放区的面积、人口、城市比战争之初增加了。到战争的第三年，即一九四八年七月份，解放区的面积已经到了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解放区的人口有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35.3%；县以上城市在解放区有五百八十六个，占全国县以上城市总数29%（全国是两千多个县以上城市）。相对来说，国民党统治区就缩小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口和占领的城市也就少了。从这个情况看，当时形势很好。当然，这时我们解放区的人口、面积、城市虽然已经增加了很多，但是，在总的力量的对比上，敌人还是占有优势，但这种优劣之势，比起战争之初来，已经不是很悬殊了。

从政治上来看，解放区经过土地改革以后，特别是克服了刘少奇抛出的土改、整党中的形“左”实右的路线（刘少奇这条土改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搬石头”，搞扎根串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等等）。进行了土改复查以后，群众的情绪很高，再加上两年的战争，我们连续获得胜利，解放区人民觉悟空前提高，支援战争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因为改变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生产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我们的反美、反蒋的统一战线也得到了扩大，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都倾向于我们，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策。毛主席在当时发表了一首诗，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实际上是解放区整个工作的方针，就是说，军队继续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继续进行战略进攻；解放区继续发展生产；再加上加强纪律性，革命就一定胜利。在毛主席这样的方针指引下，解

放区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我们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当时的大好形势。一个是东北吉林省蛟河县有一个屯子，叫保安屯，一九四七年每垧地（折合十五亩）产粮6.5石，一九四八年上升到8石，增长了23%；另一个是太行区，土改前群众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土改后变成了“早晨金皇后”（良种玉米），“晌午一六九”（良种小麦），“晚上玉环秀”（良种小米），就是说每天都能吃上玉米、小麦、小米了。国民党正相反，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情况是通货膨胀，钞票贬值，非常困难。这里也可以举几个很有趣很能说明问题的数字，供大家参考。一个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米价每担是150万元，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就上涨到了5833万元，上涨了39倍；另一个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国民党发行的票子改用“金元卷”，每个“金元卷”折原来的“法币”300万元。用了“金元卷”后的第一个十天，即八月十一日到二十日，米价每担由20.9元上涨到2000元，上涨了近100倍。把这些“金元卷”折合一元一张的“法币”，每700张法币算一斤重，那么要八万斤一元一张的“法币”才能买到一斤米。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榨，蒋管区的老百姓生活很苦，所以群众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反独裁、卖国的斗争，风起云涌。蒋介石在政治上也更加孤立，只能依靠美国的援助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正是因为这样，在蒋介石统治区的民变武装很多，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在当时蒋管区就有三万多人。这是我们的第二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我们的正面战场，第二条战线是蒋管区人民的反抗斗争；蒋介石是处在两条战线的夹攻之下。所以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处在很不利的地位。

从军事方面看，当时对我们也是很有利的。在数量上，敌人的军队在战争之初有四百三十万人（包括前后方和地方部队在内），经过两年作战之后，已经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为什么国民党军队只下

降几十万人呢？因为在两年战争中间，国民党抓壮丁补充了二百多万人，所以到这个时候，还有三百六十五万人。但是因为歼灭了很多，补充起来的部队战斗力不断下降。我们正与此相反，战争之初，我们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中六十万是地方部队，六十万是主力部队（当时叫野战军），到这个时候，我军总数已增加到二百八十八万人（其中野战军一百四十九万人）。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数目字。也就是说，在战争之初，敌我兵力对比在数量上讲，敌人是3.5，我们是1，敌人超过我们2.5倍；到这个时候，敌我兵力对比，成为1.3比1，敌人虽然还比我们多，但已经比较接近。这里再要补充说明一下的，就是蒋介石的这些部队中，还要留一部分对付我们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和群众的反抗斗争，同时，敌人还有许多大城市，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还要有部队防守。所以，他实际上能机动的兵力，并不比我们多。

在质量上，质量当然主要是指政治觉悟，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在这个时候，有两个新的情况。一个情况是，我们部队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统一部署，从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新式整军运动的开展，纯洁了我军的内部，加强了我军的团结，因而大大地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可以阅读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份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这篇文章）。第二个新的情况是，在这个时候，我军的攻坚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主要是有三个因素促成的：一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可观的炮兵，当时，东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已经有了炮兵纵队、特种兵纵队，华北有了两个炮兵旅，各个纵队（纵队等于现在的军）、各个师、各个团也都有了自己的炮兵。二是我们的部队普遍学会了使用炸药进行爆破，许多战士不是工兵，

也学会了爆破技术，用炸药炸敌人的工事、城墙。三是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攻占敌人中、小城市的经验，特别是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曾经打下了洛阳、开封，在华东战场上，我们曾经打下了潍县、兗州，在华北战场上，我们曾经打下了石家庄、运城；在东北战场上，我们打下了四平。这些城市的攻克，增加了我们攻坚作战的经验。我们有了炮兵，战士们普遍学会了爆破技术，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攻城作战的经验，这样就使我们攻击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这对我们解放军来说，是个很大的变化。我们过去主要打运动战，很少打攻坚战，到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能打运动战，也能打攻坚战，能够攻占敌人的中等城市，甚至于大城市。三大战役的特点之一，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相结合，这是叶副主席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如果不是我军攻坚能力的提高，大规模的阵地战是无法打的。总的来说，在军事上，我们数量上虽然还比敌人少一些，但是，已经少的不太多了。而在质量上，特别是部队的觉悟和攻坚作战能力提高这两点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就为我们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敌人和我们相反，由于连续被歼，特别是整军、整师的被歼灭，高级将领被我们俘虏，因此，质量下降，士气低落，战斗力已经下降很多了。

这是全国的形势。这个形势说明了：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了，已经成熟了。毛主席说：“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该坚决地进行决战。”伟大领袖毛主席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毅然发动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其次，介绍东北战场的形势。东北的形势有许多方面是跟全国一样的，比如说，政治、经济方面总的形势，跟全国一样。另外，东北

有它特殊的有利形势。

第一、敌我兵力的对比上，当时敌人正规军是四十八万人，非正规军七万人，全部是五十五万人。我们正规军十二个纵队，再加上炮兵纵队、铁道兵纵队、十七个独立师，正规军的总兵力达到了七十万人，地方兵团是三十万人，合计是一百万人。在东北战场上，不论正规军还是地方军，我们都已经超过了敌人，而且超过的并不太少。当时，在全国五大战场上正规军我们超过敌人的唯一战场就是东北战场。当时的华北战场上，我们的总兵力是四十万人，其中，野战军是三个兵团。敌人的总兵力是六十万人，是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部队。当时的华东战场上，我们的总兵力是七十多万人（其中正规军不到四十万人），敌人的总兵力是六十万人，是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刘峙的部队。在中原战场上，我们中原解放军是三十四万人（其中野战军是十多万人）。敌人的总兵力是七十五万人（包括敌人在长江的防御部队），是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所带领的部队。这里要说明的一个情况是，当时中原和华东的敌人是经常联合行动的，在一个战场上协同配合，我们两大野战军也是这样。所以在计算兵力的时候，通常是把华东、中原的敌人合在一起，把我们也合在一起计算的。在西北战场上，我们西北部队近二十万人，敌人是西安绥署胡宗南的部队，三十万人。从五大战场的敌我兵力对比情况来看，东北战场上我军处在最有利的地位。

第二、当时东北敌人正处在一种犹豫的、动摇的、举棋不定的状态中。敌人五十五万人，是这样分布的：长春敌人由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在这里带了一个兵团（第一兵团），两个军、六个师，还包括地方部队还乡团等共十万人。长春同沈阳之间完全被我们切断了，敌人不能离开长春一步。沈阳敌人，当时是东北“剿匪”总司令

部所在地，总司令卫立煌，有两个兵团（第八兵团和第九兵团）、八个军、二十四个师，全部是三十万人。沈阳的敌人和长春的敌人的陆路联系已被我们切断，和北宁线锦州的敌人的陆路联系也被我们切断。北宁线敌人，主要是指从山海关到义县这一段。这一段有敌人四个军，十四个师，共十五万人，由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东北敌人是被我们分割在上述三个地区内，陆上联系完全被我们切断了。

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份，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曾经提出过“撤退东北（把东北五十五万人撤向关内），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方针，这个方针，实际上是美国人提出来的，因为美国人的主要利益是集中在华北、华中（国民党讲的华中就是我们的华东、中原）。当时，蒋介石想实行但又没有敢实行这个方针。蒋介石内部矛盾很多，如果实行，他在政治上更要加速垮台，经济上也会更加困难。所以当时东北敌人正处在走和守这样一个犹豫、动摇状态之中，这个情况对于我们也是非常有利的。

第三，当时东北解放区的总面积已经占全东北总面积的97%（包括热河在内），敌人只占3%（长春一个城市，沈阳和沈阳周围的两三个县城，再就是北宁线上的几个城市和热河的承德，就是这几个地方）。解放区的人口占东北总人口的86%，敌占区占14%。东北的铁路，当时二万一千多公里，敌人统治区铁路一千二百多公里，有两万多公里铁路在我们手里。这就是说，东北的后方是很坚固的，支援战争的物质力量是很强大的。

这三个情况说明，东北的形势在全国几个战场上比较起来，对我们更加有利。东北有利形势的形成，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东北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结果，而林彪一伙却把

“功劳”堆在林彪身上，这是对历史的无耻篡改。林彪到东北以后，一再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讲。我们介绍东北的战略形势，主要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东北战场上，我们处在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毛主席说：“要慎重初战”，在初战时，“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毛主席把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东北战场上，就使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我们了解了当时全国整个的战略形势，又了解了东北的战略形势，就会更加深刻地领会到毛主席的决定和战略部署，即通过战略决战，就地歼灭敌人的各个战略集团，以便加速战争进程的决策，是多么英明。也可以看到，在辽沈战役中林彪的表现完全是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无视当时有利的战略形势。所以了解了全国的战略形势，和东北当时的战略形势，更加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林彪的问题究竟在那里。关于当时战略形势的一些论述，《毛泽东选集》上有几篇文章：一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二是《关于情况的通报》；三是《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我们建议同志们学这三篇文章。

三、辽沈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 斗争的主要问题

辽沈战役自始至终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在这个战役中，林彪在情况判断、定下决心、执行毛主席的战役方针、战役主攻方向的选定、战役部署指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为了指示林彪应该怎样作战，纠正他的错误，毛主席在整个战役期间，发了七十七份电报给林彪，对林彪的错误作了坚决的斗争，给了林彪以极为严厉的批评，“材料之一”里，选用了二十六份。同

志们都看了“材料之一”，当我们送给中央审查的时候，据中央首长讲，毛主席看了这个材料以后说：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就是不敢打。这是中央首长向我们传达毛主席讲话的大致意思。我们体会毛主席讲的真是难打，难在那里呢？不是难在我们打不下敌人的某一个地方，或消灭不了某一部分敌人，而是难在林彪的干扰和破坏。林彪很顽固啊！我们从七十七份电报里面，就可以看出，为克服林彪的干扰和破坏确实费了很大的力量。

在辽沈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两种军事思想的斗争，主要是表现在三个问题上，就是在“材料之一”里所提到的三个问题；其中，主要的又是表现在第一、第二个问题上。下面我就根据这三个问题介绍一些历史情况。

（一）林彪反对毛主席关于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

这个斗争的实质，就是敢不敢和敌人决战。毛主席要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林彪不敢和敌人进行决战。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作战的方针问题，我们在这份材料里边选了十四份电报，从一九四七年五月份的一份电报开始，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的那份电报为止，全部选了十四份。在这些指示中，在方针问题上最主要、最关键性的一点，就是要林彪率东北我军的主力南下到北宁线上，把蒋介石的部队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不让敌人撤向华北、华中。这是毛主席在这十四份电报中最主要的一点。现在我就把其中的几份电报在这里说一下。

这里选的第一份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发给林彪的电报。我们认为这份电报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发报的时间问题。早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也就是说，在辽沈战役发起前一年零四个月，

在这样早的时候，毛主席就告诉林彪要准备南下作战。因为毛主席已经预见到将来会有一个战略决战的，要解决东北问题，东北主力就必须南下作战。因此，在一年零四个月前，就把战略意图告诉了林彪，要林彪准备南下作战，积极为南下作战创造条件，作好准备。

第二份电报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的这份电报。着重是解决战场问题。毛主席告诉林彪，在北宁线、平绥线的沈阳到锦州之间、锦州到山海关之间、山海关到天津之间、天津到北平之间、北平到张家口之间，均为很好的作战地区。这就是说，在整个南线都是很好的战场。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林彪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住在哈尔滨，直到辽沈战役才下来的。他两只眼睛只看到北线的长春，看不到南边。所以毛主席在这份电报里告诉林彪，南面是个很好的作战地区，要他注意南面。

第三份电报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发给林彪的。这份电报明确地提出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这样一个方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关门打狗”。在这份电报里边，毛主席还分析了东北敌人可能向华北、华中撤退，而如果东北的敌人撤向华北、华中的话，敌人在粮食上、经济上、政治上可能会增加一些困难，但是敌人兵力集中了，对我们是不利的。因此毛主席讲：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把敌人歼灭在东北为有利。

林彪对待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是抗拒的态度。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东北冬季攻势结束起，到九月十日左右东北部队南下止，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里，林彪对待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都是采取抗拒的态度。在这半年中，林彪的抗拒大体上分为两段：

第一段，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整个四个月

的时间，林彪借口要打长春，但是又不敢打长春，而把东北的主力留在沈阳、长春之间，徘徊犹豫，无所作为。我们这里也选用了林彪的几份电报。这一段时间中，林彪的电报很多，但这几份最具有代表性。我把这几份电报解释一下。

这里选用的林彪的第一份电报，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的。在这份电报里面，林彪提出来要打长春，还说打长春是他的根本意见。林彪又说：其他的意见，包括主席要南下作战的意见，都是不适宜的。从这份电报看，林彪好象是真的要打长春了。

那么他是不是真的想打长春呢？其实并不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选的第二份电报即五月五日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林彪提出了东北野战军作战的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打长春，可是林彪讲，打长春我没有把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这个方案不能执行。第二个方案，是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好象是要执行主席的方针。可是林彪说，我把主力南下以后，如果敌人往城里一跑，我也打不下来，所以这个方案也是不行的。第三个方案是包围长春，打从沈阳向北增援的敌人；打完了增援的敌人，再回过头来打长春。林彪认为这个方案是可以执行的，是最好的方案。所以他这一份电报和前一份电报比，调子已经变了，不是坚决打长春，是说要打增援的敌人。

第三份电报是五月二十九日的。在这份电报里面，林彪的调子又变了。在五月二十四日，林彪用两个纵队打了一下长春，主要是打长春的飞机场。自己伤亡了两千来人，消灭了敌人五、六千人。这个时候，林彪给中央发了这个电报，说是我军对长春要采取另外的一个方针，叫做“久困长围”，也不打援，也不攻长春，也不南下。就是说长期把长春围起来，等敌人突围，在突围的过程中消灭敌人。这个方案实质就是把主力停留在长春、沈阳间不打仗，等待。那么，这样敌

人会不会突围呢？我们的几十万军队放在长春沈阳之间，敌人是根本不会突围的。因为他有十万人守城，粮食弹药有空投接济，而突围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当时敌人还有一个企图，就是想用长春来吸引我东北主力。所以林彪的“久困长围”，其实正好适应了敌人的需要，是个更加荒谬更加行不通的方案。

我们介绍了林彪的三份电报，这几份电报完全能说明林彪借口打长春，实际上并不敢打长春，以此来拒绝执行毛主席南下作战的方针。一直到七月二十日，林彪发了一份电报给中央，表示愿意南下作战。林彪的这份电报是这样讲的：最近东北局常委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就是说，主席提出这个方针约四、五个月以后，林彪才勉强同意南下。这份电报里边，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林彪电报中反映的同意南下的主张是经过东北局讨论的。由此可见东北局的同志跟林彪是有斗争的。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东北局当时开会的记录，所以不知道内部究竟是怎样进行斗争的。但是从电报里可以看出，那是进行了斗争的。因为林彪长期以来十分顽固的拒绝南下，只是在东北局讨论了行动的问题以后，林彪才表示同意。二是林彪并不是真正认识了南下作战的战略意义才同意南下的，他在这份电报里根本就没有提到主席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问题，就可以证明，他后来继续找借口抗拒南下的情况也可以证明。所以，他的同意南下作战是被迫的、勉强的。

上面我们介绍的，是第一段时间的情况。由于林彪抗拒南下作战方针，在这段时间内，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第一个就是东北少进行了一次战役。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给中原军区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志的一份电报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讲：东

北我军由于两次准备打长春，最后还是恐长春城坚难下，放弃攻长（春）计划，故上半年少进行了一次战役。这个后果就使东北野战军浪费了半年时间，少打了一仗。第二个后果是拖延了南下时间。本来辽沈战役是可以早发起的，因为林彪的抗拒、干扰，拖延了南下时间。

第二段是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九月十日左右。林彪是如何抗拒毛主席的南下作战方针的呢？我们看到，电报里边所反映的情况，林彪找了两个借口。一个借口是说，南线的敌情很严重，在北宁线和北平附近，还有傅作义的部队，因此不能马上南下。第二个借口是讲东北粮食很困难，铁路被水冲断了，所以不能南下。关于这两个问题，林彪怎么说的，我们这里也选了林彪的几份电报。七月二十日林彪同意南下作战。七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复电林彪，分析了南下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指出了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要林彪加紧作好准备，以便在八月份在南线打响；毛主席还批评林彪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要你们不要把南进作战的困难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但就在同一天，林彪也发了一份电报给主席。林彪讲：要中央设法派兵去围攻大同，把傅作义的部队分散到大同方向。八月六日他有一份电报，八月八日有两份电报，都是讲南面敌情很严重，要中央派杨成武的部队包围大同。包围的目的就是要调动傅作义部队向大同方向增援，这样他可以南下。而且，林彪说，我们东北部队要看杨成武部队什么时候行动才能决定我们行动的时间。就是说，东北部队的行动决定于杨成武部队的行动。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这份电报里边林彪讲，应该是杨成武部队先行动，调动傅作义部队向西，然后他再行动。他在这里还讲，东北铁路桥梁被大水冲断了，我们要在八月底或九月上旬才能出动。但是他又转过来讲，

如果杨成武部队能够早出动，我们也能早出动，大水冲断了铁路桥梁，就不成为东北部队行动的障碍；杨成武部队如果不出动，大水冲断了铁路桥梁，就是东北部队的障碍，不能走。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林彪是在那里绕圈子，找借口，根本的问题是怕傅作义部队。八月八日林彪给了中央一份电报，一再强调南线的敌情严重。林彪说，傅作义的什么什么部队到了什么什么地方了，华中的什么什么部队又调来了。林彪判断傅作义的行动企图，说傅作义很可能协同锦州方面的部队，跟沈阳敌人打通联系，甚至还可能增援长春，解长春之围。就是说，傅作义不但要到锦州，还要到沈阳，不但到沈阳，还要到长春。这是很荒谬的。我们知道，当时傅作义和卫立煌矛盾是很深的。毛主席对傅作义和卫立煌这两个敌人是有很深刻的分析的。傅作义很善于保存实力。他原来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最早是阎锡山的一个师长，后来爬的很高，他的老家在绥远。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嫡系。傅作义跟卫立煌的矛盾很深，决不会冒着自己部队被歼灭的危险自愿来增援卫立煌。另外一个情况，从当时敌人总的情况来看，敌人的增援，不到我们消耗到一定程度，他是不会去增援的，即使蒋介石的嫡系对嫡系也是如此，何况是傅作义呢。林彪把傅作义的积极性估计的太高太高了，这种估计跟主席历来的指示完全相反。林彪在八月八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边进一步说，杨成武部队行动的时间越早越好，提出了东北部队行动的时间要看杨成武部队行动的迟早才能够决定。所以在八月九日毛主席给林彪一份电报。毛主席具体地分析了傅作义几个部队的动向，指出林彪的估计是不对的。毛主席讲，傅作义的部队决不会妨碍你打锦榆线（从锦州到山海关这一线）。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该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毛主席说：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毛主席还批评林彪说，你们所说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部队的行动，这种提法是

不正确的。很显然，你们一百万部队的行动，怎么能取决于四、五万部队的行动？经过毛主席这个批评以后，林彪在八月十一日这份电报里讲：我们现在部队的行动，不以杨成武部队的行动作为我们行动的标准了，但是我们行动的时间还是不能定。为什么不能定？说是铁路冲垮了，粮食不能运，部队南下没有粮食吃。针对着林彪的这份电报，毛主席八月十二日给了林彪一份很长的电报，这份电报批评林彪是很严厉的。主席从来是很尊重各个野战军的首长的。发电报都是用商量的口气，经常征求各个野战军首长的意见，虽然主席心里有底，但是还是拿出来征求意见。如果你提出的意见合理，主席很快就采纳。主席在这份电报里讲，关于敌人从东北撤到华中的可能，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的时候就告诉了你们。就是二月七日那份电报里边讲，敌人可能撤向华北、华中。关于准备粮食的问题，我们也是老早就告诉了你们，但是你们两个月来是不是执行了我们这个指示，你们一个字都不提，而现在你们又来电报，因为没有粮食你们不能行动，说明准备工作就根本没进行。毛主席批评他说：你们最初的电报，一会说是南线敌情严重，叫杨成武部队先行动，而且你们提出来东北部队的行动要根据杨成武部队的行动时间来决定。当我们同意杨成武部向西行动，同时指出了你们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你们不提这个问题了，但还是不能决定行动时间，说是粮食没有准备。主席讲：对于你们自己，什么事情都要照顾到，敌情要照顾到，粮食要照顾到，交通要照顾到，对杨成武部队你们为什么不照顾一下？你们对杨成武部队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的敌情判断，根据最近几次电报来看，你们也是很轻率的。毛主席最后讲，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主席用这样的口气批评是少有的，只是在给林彪的电报里面

有，而且在辽沈战役中就有好几份。经过这份电报的批评，林彪才不敢提了。但是，实际上他还是没有部署部队很快南下。随后，中央又有一连串的电报给林彪，具体告诉他粮食问题应如何解决，甚至告诉他北宁线附近是产粮区，粮食有的是，东北局手里有布可以用布去换粮食。象这样具体的问题都作了指示。这样林彪才不得不在九月十日左右部署部队南下。当时主席是要他在八月中旬至迟在八月底在北宁线打响的。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两个借口能不能成立呢？我们认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关于南线敌情严重问题，主席在电报里已经分析的很清楚了，具体分析了傅作义的部队动向问题，指明了并不严重，所以，关于敌情严重问题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尤其不应该把杨成武部五万人的行动作为自己一百万人行动的先决条件，这种先决条件确实非常荒谬。

第二个关于粮食问题，实际上也不能成立。为什么不能成立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东北那些来往电报、材料来看，在整个战役过程五十二天中间，没有那一个纵队，那一个师，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没有饭吃了，赶紧送粮食给我。这是一个证明，说明各纵、各师不是缺粮。第二个证明是陈云同志在“九·一三”以后曾经揭发过一个材料。陈云同志说，当时粮食并不困难，黑龙江是我们的粮仓，有的是粮食。在战役的过程中间，当时每一个战士的粮食已经有五百斤，到战役结束统计，每一个战士的粮食达到了一千斤。一个人一个月五十斤，可以吃二十个月。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还有大量余粮输送到沈阳、长春，没有用完，又送到华北，准备以后东北部队入关作战。可见林彪的所谓粮食问题严重，完全是个借口。我们再退一步说，即使粮食真的困难，作为林彪这样一个大区的战略指挥员来说，完全是应该自己

解决的，决不容许拿这个作为向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

正是因为在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中，林彪找了那么两个借口，不执行主席南下作战的指示，致使东北部队的行动又推迟了两个月。加上前边四个月，合起来就推迟了半年。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林彪拒绝南下作战的问题。

（二）林彪抗拒毛主席关于坚决打下锦州，全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的指示

毛主席在许多电报里边告诉林彪，要坚决打下北宁线上的三点，就是义县、锦州、山海关，特别是锦州一点。毛主席讲，你们能不能取得战场的主动权，就看你们能不能打下锦州。为什么锦州这么重要呢？

第一、锦州离山海关将近二百公里，离沈阳是二百三十多公里，它是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和东北的卫立煌集团联接的枢纽。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打下锦州，我们就可以确实控制北宁线。如果锦州打不下来，只打下来一些小的城市，这段铁路我们还是控制不住的，因为锦州有敌人十万人在那里。只有打下锦州，我们才能控制这段铁路。而控制这段铁路以后，就可以使卫立煌集团完全装在我们的口袋里边，可以完满实现主席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

第二、如果我们能够迅速地打下锦州，就能打开战场，调动敌人，便于我们下一步行动。锦州是东北敌人陆上的唯一通道，地位十分重要。我们打锦州打得很激烈时，蒋介石是一定要来增援的。等敌人出来，到了大凌河以北离锦州不远的地区，我们正好打下锦州，就可以就近转用兵力，歼灭增援的敌人于运动中。这是主席的基本意图。毛主席的许多指示里边讲到这个问题。

第三、如果我们能迅速地打下锦州，就可以很快地歼灭敌人十

万，削弱东北敌人五分之一的力量，特别是对敌人守城市的信心，是个十分严重的打击。

所以能不能迅速打下锦州，是当时整个战役能不能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毛主席在许多电报里强调，你们要坚决打下锦州。

当时有没有条件打下锦州呢？有条件。条件在那里呢？从军事上说来，主要有两条：

第一、锦州敌人虽然号称十万，是一个兵团、六个师，后来又空运了一个师。但这些师中间，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一些部队，是被我们歼灭了好几次的，歼灭以后重新建立起来，又歼灭一次又重新建立起来，象四十九军的七十九师，被我们歼灭了三、四次，歼灭一次重建一次，象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强。二是有些部队是地方部队刚升级起来的，东北的暂编师都是刚升级的部队，这些部队装备差，战斗力也并不太强。所以毛主席在一份电报里边讲，因为这些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我们消灭了这些敌人，蒋介石并不心痛。所以敌人工事虽然比较强，但是战斗力并不强。而我们部队则正好相反，东北部队是关内各解放区在抗战结束后调去的老部队，有些还是红军底子的部队，很能打仗，再加上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准备又好，又有强大的后方。以我之强打敌较弱的部队，是有把握打下锦州的。打锦州我们总攻城垣，只用了三十一个小时就全部消灭了敌人，就可以说明敌人并不太强和我们部队确实能打。

第二、我们打锦州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毛主席具体地分析了我们打锦州时敌人能否增援的情况。毛主席讲，我们打锦州，傅作义部队不会积极增援，傅作义是善于保存实力的，很狡猾的，他决不会轻易地增援锦州，因为锦州是卫立煌的地区，打下锦州以后，责任在卫立煌那里，傅作义不负责任。毛主席还讲，因为长春有敌人十万人，就

牵制了沈阳的敌人，他不能把长春敌人完全丢掉了，去增援锦州。同时，沈阳敌人处在麻痹的状态之下，他在开始的时候摸不清我们究竟是真打锦州还是假打锦州，当他们判明我真打时再出来增援，就为时已晚，正好为我转移兵力打援创造条件。因此毛主席有几份电报中指出，长春敌人的存在对我们是有利的，你们不要急着打长春；而当你们将要打下锦州的时候，沈阳敌人来增援也来不及了，这样可以给我们打锦州以充裕的时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锦州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又有条件打下，所以说，锦州是东北敌人整个防御体系中一个战略要点，但又是一个弱点。毛主席在九月二十九日一份电报里曾说：我们觉得，打下锦州是有较大把握的，而且是于全局有利的。这就是关于打锦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结论。

但是林彪又怎么样呢？一直是怕字当头。拒绝打锦州。我们把林彪在打锦州问题上的错误归纳成为四个怕和八个问题。

林彪的四怕就是：一怕傅作义增援，抗不住；二怕葫芦岛、锦西的敌人来增援，葫芦岛、锦西靠锦州比较近，葫芦岛又是海口，敌人可以海运增加兵力；三怕沈阳敌人向锦州增援，甚至顾虑沈阳敌人把长春敌人接出来之后，合在一起向锦州增援；四怕锦州敌人多，工事强，打不下来，伤亡一大堆。

林彪的四怕，实际上就是对敌情的错误判断，对敌情的右倾看法。由于林彪从右倾机会主义出发，在打锦州的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是毛主席逐个批评和纠正了他的错误后，才打下了锦州。综合起来看，林彪的错误是：

第一、林彪率部队南下以后，不打锦州打承德。林彪讲除了锦州不打，其它地方都可以打，为什么呢？因为其它地方敌人最多的是

个师，锦西、葫芦岛有敌人三个师即一个军。敌人人数比较少，他认为可以打，唯独不打锦州。打下义县、高桥、锦西、兴城、绥中这五个城市以后，主力转向承德，打傅作义的十三军，然后在承德、北平之间进行活动。这实际上是打下五个城之后，把主力全部西调，让敌人恢复北宁线，让敌人有可能恢复原来的态势，或者说让东北的敌人全部跑掉，撤向华北。林彪的几份电报里边，都是提出了这个作战方案。毛主席批评了林彪这个意见，在电报里指出，你们打完了北宁线几个城市以后，不要去打承德，你们要去打锦州，要坚决打下锦州。

第二个错误就是平分兵力。正是因为林彪对敌情作了右倾判断，因此，就出现了平分兵力的错误。怎么平分的呢？林彪在九月十日定的部署是把六个纵队放到北宁线上，再加上三个独立师，把另外六个纵队和十四个独立师放在沈阳、沈阳以南和长春，对付沈阳、长春的敌人。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他怕长春敌人突围，怕沈阳敌人增援。林彪这个部署是平分兵力的部署，把主要力量放在北边次要方向上，北宁线这个主攻方向反而兵力少。毛主席对林彪这个部署也多次给以批评。经过毛主席多次批评以后，林彪一直到十月三日才调整了他的部署，从沈阳、长春这个方向抽了两个纵队下来，到北宁线上，就是说，在北宁线上使用了八个纵队。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给林彪的一份电报里指出：我们过去一个月中间，曾经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作，叫你们要重点的部署兵力，你们到现在才想通了这一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就是锦州、锦西方面），虽然在时间上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做。从你们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有一个月之久，才将攻击的重点问题弄清楚，可能对作战受到一些影响，但平分兵力的错误算是纠正了。毛主席要林彪应从这件事情中间接受教训，就是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

兵力。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林彪平分兵力的错误所下的结论。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林彪他是应该知道的，可是林彪在辽沈战役中间如此顽固地要平分兵力，完全是由于他思想上的右倾，错误地判断了情况。

第三、正是由于林彪怕字当头，消极避战，所以林彪的指挥所迟迟不向前进。东北野战军的部队，是在九月九日开始向北宁线行动的，林彪经过主席一再批评督促后，一直到十月一日才随指挥所离开哈尔滨，到了双城。双城就在哈尔滨南边几十公里。据有的首长说，林彪离开哈尔滨时，凄凄惨惨戚戚，象赴刑场一样，可见当时林彪是一个什么心理状态。又经过了主席的督促，到了十月四日才到了阜新。所以，毛主席在十月三日电报里边，告诉林彪，你们从这一个事件里边，要接受的第一个教训（刚才讲的第二个教训是集中兵力问题），就是你们指挥所应该先于部队行动，到达所要攻击的方向。毛主席讲：这一点也是我们很早向你们指出来的，因为你们没有及时这样做，因此，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你们就看不到北宁线，这就直接影响了战役指挥，直接影响了对敌情的判断。

第四、正是林彪怕沈阳敌人出来增援，因此，林彪开始部署是把阻援部队紧紧地靠近沈阳，不让沈阳敌人出来，这是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战略指导思想相对抗的。毛主席一再告诉林彪说：你们要准备打一个大的歼灭战。怎么一个大的歼灭战呢？当你们打锦州快要打下的时候，如果这时沈阳敌人出来增援，而且到了大凌河以北的地区，这时，你们就可以转移兵力去打增援的敌人，这样你们可以把增援的敌人消灭掉。这是毛主席对整个战役总的部署。林彪把部队紧紧钉在沈阳附近，跟毛主席部署是相反的。所以毛主席在电报里指出：你们不能把阻援的部队逼沈阳太近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敌人，已经

是很害怕我们了，如果紧逼沈阳以后，敌人就不敢出来增援，这样，就不能打第二仗。经过了毛主席的批评指示以后，林彪才重新调整了他的部署。战役的进展完全是按照主席的预见发展的，首先打下了锦州，然后敌人到了大凌河以北地区，我们打锦州的主力部队转移，完全消灭了沈阳增援的敌人。

第五、因为林彪怕字当头，因此，在北宁线的行动非常迟缓。九月十日左右部队已经开始南下，在南边的两个纵队已经开始接近了北宁线，十一日北边的部队正式开始南下，但二十多天来没有象样地打一个据点。对于这一点，毛主席九月二十九日电报里批评林彪说：我军从九月九日开始出动，至今已有二十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经过批评以后，林彪才部署打义县，并且在十月一日打下了义县。

第六、正是因为林彪极其害怕锦西、葫芦岛敌人增援，因此，他又提出不打锦州，回头打长春。林彪在得到了锦西、葫芦岛增援了一部分敌人的消息以后（敌人增援了五个师，加原来的敌人共是九个师），他在十月二日马上向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说：我不打锦州了，我要回去打长春。我们十月一日打下义县，开始包围锦州。十月二日，蒋介石飞到沈阳，部署从傅作义处抽五个师，从华东抽两个师，到葫芦岛，加上原来的四个师，向锦州增援。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林彪提出不打锦州回头去打长春，是非常错误的。因此，毛主席在十月三日、四日连续发了三份长电报批评林彪，批评的言词极其严厉，指出林彪这个所谓建议是个绝大的错误。毛主席具体分析了锦西、葫芦岛敌人的增援，指出：你们有两个纵队在那里阻援，就可以胜任愉快，不用害怕。你们如果回去打长春，对你们非常不利，对整个战局非常不利。毛主席指出：打下长春不能帮你们取得主动地位，只有打

下锦州才能使你们有主动权。战后林彪有一份电报给中央，报告整个辽沈战役的情况，他讲：“在打锦州的过程中间，我曾经动摇了几个小时，以后马上纠正了这个错误。”同志们可以看到，错误是不是只有几个小时，是不是马上就纠正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要不是毛主席十月三日那么严厉的批评，林彪是不会纠正他的错误的。

第七、当敌人向彰武前进时，林彪打锦州的决心又动摇。十月十日，我们在锦州外围作战的时候，蒋介石第二次飞到了沈阳。他下了两道死命令，一要葫芦岛的敌人向锦州增援，一要沈阳敌人廖耀湘第九兵团（十一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向锦州增援。廖耀湘在新民集结完毕后，他不是直接向西南锦州方向，而是向北向彰武这个方向，想切断我们的铁路线。林彪非常害怕敌人占领彰武以后，把我们的后方切断，所以顾虑很多。打锦州的决心十分动摇。又是毛主席解除了他的顾虑。毛主席讲，敌人向彰武前进，对于你们是有利的，你们不要害怕，这表明，卫立煌不敢大胆增援锦州，想用取巧的办法，就是说名义上增援了锦州，实际上我还保存着力量。因为锦州方向有我们主力，敌人可能在增援时被我们歼灭，而彰武方向却没有我们主力。所以这叫取巧的办法。实际上卫立煌向彰武方向前进，正表示卫立煌无能为力。所以毛主席告诉林彪，只要不怕后方联络线被敌人切断，敌人占领彰武对我们并非不利。这样，才算解除了林彪的顾虑。实际上，根据后来战况发展看来，敌人占领彰武根本没有起到作用，相反离锦州越来越远了。

第八、林彪十分害怕长春敌人突围，所以在打锦州过程中动动摇。毛主席及时电告林彪：长春敌人你不要先去打他，留在那里很好，而且长春敌人是不会突围的。在“材料之一”二十五页上，毛主席十月十一日在给林彪的指示里边讲，国民党放出撤出长春的空气，是

为引起我军注意长春，并不是要真的马上撤出长春。所以，要林彪两个眼睛不要去看长春，还是要看着锦州，把注意力集中在锦州。

这八个问题，都是林彪在打锦州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由于毛主席的许多电报批评了他，排除了他的干扰，才保证了打锦州的胜利。

（三）关于林彪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抢占营口的问题

我想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关于打锦州和整个战役的过程。结合这个过程，介绍林彪拒绝毛主席关于抢占营口的指示的情况。

从毛主席十月三日、四日这三份电报，批评了林彪以后，林彪重新调整了部署打锦州。在打锦州的时候，毛主席在十月四日的电报里边告诉他，虽然被你拖延了时间了，但是你现在还不要那么紧张，还是要经过充分准备。这样，林彪调整了部署，用五个纵队攻城，一个纵队在高桥作战役总预备队，两个纵队及三个独立师阻击葫芦岛敌人。十月九日开始打锦州外围，到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日早晨，外围全部扫清。经过一段准备之后，到十四日上午十点钟开始攻锦州。攻击锦州的五个纵队分成了三个集团，主攻集团在北边，是二纵队、三纵队加上六纵队的一个师，再加炮兵纵队的主力，从北边向南攻。另外组成了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七纵队、九纵队，由南向北攻，八纵队由东向西攻。组成了这样三个集团。十四日上午十点钟开始炮火准备，到了十点五十五分，将近十一点的样子，北边的集团首先突破了敌人的防御，突破了敌人的城墙，进入到巷战，纵深战斗。接着，南边集团也突破了敌人的城墙，向纵深发展。到了傍晚的时候，担任由东向西攻的八纵队突破了敌人的城墙，向纵深发展。到了十四日的傍晚，已经在锦州城打开了十个突破口，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向纵深发展。到十五日拂晓的时候，全部打下锦州，除了锦州的老城，大概还有一

万多人，还没有打下来，其它地区的敌人全部肃清了。老城是在十五日的中午才开始打的，到十五日傍晚全部歼灭敌人。消灭敌人七个正规师，再加上地方部队、后勤、特种兵共十万人，俘虏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和兵团司令芦浚泉。攻下锦州只用了三十一个小时，这说明锦州并不是太难打，也说明东北部队确实能打，战斗力强。

在我们打锦州的过程中，葫芦岛敌人九个师向锦州增援，被我们四纵、十一纵阻击，无法前进。在十三日那一天，四纵二十八团在塔山地区打垮了敌人傅作义的王牌师独立九十五师的十多次攻击，消灭敌人一千多人，打得十分英勇顽强，获得了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敌人从十日开始增援，到十五日傍晚我们打下锦州为止，六昼夜猛攻，没法突破我们阻援阵地，我们打死敌人六千多人，俘虏敌人六百多人，敌人的增援没有成功。

十五日快打下锦州时，蒋介石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第三次飞到沈阳，部署向锦州的增援，同时命令长春的敌人突围。蒋介石派了一架飞机到长春去，空投了一个书面命令，叫郑洞国带上两个军再加上其它部队共十万人，向沈阳突围，告诉他，如果你不突围，你就完了。锦州很快打下来以后，对敌人震动很大，长春敌人不敢突围。到了十七日，跟我们有关系的云南部队六十军，在曾泽生的领导下起义了（后来编成了我们的五十军）。这个时候，敌人的新七军更加孤立了，郑洞国没有办法，只能在十八日派人到我们这边来，说是要缴械投降，十八日签订投降书，开始放下武器，正式投降，十万人在十九日早晨全部解决了。

就在长春敌人快要投降时，蒋介石一看情况不妙，十八日又飞到沈阳，部署葫芦岛和彰武的敌人向锦州对进，准备恢复北宁线，把沈

阳敌人接出来，同时蒋介石还要卫立煌马上抢占营口，保持一条海上通路，以便必要时撤走一部分部队。廖耀湘兵团是十一日占领彰武的，廖耀湘兵团原来是五个军、十一个师，另三个骑兵师，其中包括两个主力军，就是新一军、新六军。十一日占领了彰武后，这个兵团就在彰武徘徊不前，不敢向锦州前进。到了十八日蒋介石飞到沈阳，就给廖耀湘兵团增加了一个师，就是二〇三师的三旅到彰武。限定他二十日向锦州方向进发，非要拿下锦州，恢复北宁线不可。同时，蒋介石又叫杜聿明（原来是徐州“剿匪”副总司令）到葫芦岛，带上九个师配合廖耀湘兵团南北对进，恢复北宁线。

根据这个情况，毛主席给林彪的电报说：廖耀湘兵团要恢复北宁线，这对我们很有利，你现在要把葫芦岛方向作为钳制方向，把准备打葫芦岛敌人增援的部队调转回来打廖耀湘兵团。同时毛主席还指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派部队去营口，构筑工事，阻止敌人占领营口，可以派包围长春的部队去，但如果时间来不及，就先要大虎山地区的十纵队去。从十八日到二十五日，连续有七份这样的电报。

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东北野战军就作了部署，用一个纵队正面阻击廖耀湘兵团；用两个纵队在廖耀湘兵团侧后跟进；另外部署攻锦州的部队于二十、二十一日分三路向黑山、大虎山方向前进，迂回廖耀湘兵团两翼。但对营口，林彪并没有派十纵队去控制，只在二十二日派了辽南独立二师向营口方向前进。二十四日，独立二师正在接近营口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林彪的又一个命令，要它迅速折回，向黑山、大虎山方向，准备参加会战。所以当天独二师马上折回。这样，营口就空了出来。二十五日，辽阳敌人第五十二军就乘机占领了营口。毛主席批评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着。为什么毛主席要这样批评呢？因为锦州打下，北宁线被我们切断后，沈阳敌人只剩下营口这

条海上通路；这时，蒋介石又在天津、塘沽集中了一批船，能运几万人。所以营口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当然后来战况发展很顺利，东北敌人很快被我们消灭了。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敌人控制了营口后，沈阳敌人很可能从营口撤走几万人。

我们转过来再介绍廖耀湘兵团的情况。二十日，廖兵团南下，二十二日开始和我们大虎山、黑山地区的十纵队接触，打了三天，我们迂回的部队到了廖耀湘兵团的两翼和侧后。这个时候，廖耀湘发现情况不妙，怕很快会陷入我合围圈内，因此就赶紧向营口方向跑，这是二十五日晚上的情况。廖兵团的先头四十九军的一〇五师及新六军的骑兵团走到台安附近的时候，恰好和我们独立二师遭遇。那时敌人已成了惊弓之鸟，非常害怕，只碰到我们一个独立师，就误认为是我们的野战军，所以马上就往回跑，想经过新民逃到沈阳。先头往回一跑，反而把本队冲乱了，敌人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中。这时我各路部队都已从四面迫近敌人，一下子把敌人包围起来，而且把敌人搞得更乱了。我们在完成对廖兵团合围的同时，也完成了战场分割，把敌人插成若干块，敌人非常乱。二十六日晚上，我们又把廖耀湘兵团部打掉了。敌人找不到兵团司令，失去了指挥，各自乱窜。我们就立刻展开围歼战，到二十八日就全部歼灭了敌人，这样十万敌人又被我们消灭了。

消灭廖兵团以后，毛主席要林彪赶紧向沈阳、营口进军，这样，东北野战军就以主力向沈阳、营口这个方向前进。十一月二日，全部占领了沈阳，消灭了敌人十四万多人；敌人的总司令卫立煌先于我们坐飞机跑了，沈阳的指挥大权交给了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结果，周福成被我们俘虏了。同时我们在十一月二日到了营口，消灭了敌人一万多人；敌人五十二军军部、一个师部、三个团在我们到达营口之前就

上船逃跑了（这股敌人逃到了上海，后来在上海战役中被我们消灭了）。这样，辽沈战役全部结束。

从我们介绍的辽沈战役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打锦州确实是个关键，我们打下锦州后，就完全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迫使敌人处在更加被动更加不利的态势下，迅速被歼灭。

林彪在辽沈战役中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就介绍这些。从上面介绍的辽沈战役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几个看法：

1. 辽沈战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指挥的。辽沈战役在战略上战役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决定的。同志们，林彪死党周赤萍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作《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这本小册子，可能有些同志已经看到了，现在是个靶子。周赤萍这个小册子把林彪吹得神乎其神，完全颠倒了历史事实。我现在念几段给大家听听。周赤萍说：当时我军主力集中在长春、四平一线。摆在我军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怎样打？一般人按照通常的打法看来，以先打长春为宜。周赤萍在讲了一通一般人要打长春的理由之后，马上又设问道：但是先打锦州又如何呢？周赤萍回答说：一般人认为这样做是冒险的。在周赤萍的小册子里，林彪当然是超出“一般人”的，所以周赤萍接着说：林总又是怎样指挥的呢？林总深知（不是一般的知，而是“深知”）：临近溃灭的蒋军，战斗力已不复当年，根据我军的力量，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锦州，以少数部队牵制，也一定能够阻止长春、沈阳敌人的突围和阻住敌人关内的援兵，就是傅作义的增援。所以周赤萍下了一个结论说：林彪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主张集中兵力先打锦州。同志们看了中央转发的“材料之一”，又听了今天的情况介绍，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周赤萍完全是颠倒了历史事

实。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是毛主席下的，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是毛主席提出和坚持的，坚决打下锦州消灭范汉杰兵团的决心是毛主席定下和坚持的，林彪的一系列错误是毛主席通过斗争加以纠正的。而正是林彪认为蒋介石当时战斗力很强，傅作义当时的战斗力也很强，顾虑重重，不敢和敌人决战，不敢南下，不敢打锦州，顽固地干扰毛主席的决心、部署和指挥。林彪死党李作鹏、张秀川这些家伙还吹捧林彪说，三大战役是林彪亲自指挥了两大战役，林彪从长白山打到五指山，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林彪是“天才的军事家”、“天才的战略家”、“常胜将军”等等。从辽沈战役中林彪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林彪推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可以看出，林彪死党为他吹嘘的那一套，完全是颠倒了历史事实的。这些家伙之所以如此起劲地为林彪涂脂抹粉，无非是为林彪搞“克己复礼”，搞复辟做反革命的舆论准备。

2. 辽沈战役中间两条军事路线、两种军事思想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军事思想，排除了、克服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军事思想的干扰、破坏，才保证了这个战役的胜利。

林彪这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辽沈战役中间从战役方针、战役方向、战役组织指挥等方面来说，主要表现为畏敌如虎、右倾动摇。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的那样，林彪首先右倾地估计形势，判断情况，“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我军的力量”，因而产生了不敢和敌人决战，不敢南下北宁线，不敢打锦州，平分兵力，指挥上顾虑重重等一系列的右倾错误。毛主席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这里主

要是指的林彪。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一系列错误，都是毛主席逐个加以纠正，逐个加以克服的；克服这些错误，是经过了反复斗争的。所以，如果没有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胜利，就不可能有辽沈战役的胜利。

3. 从辽沈战役的过程可以看出，林彪的这条军事路线，完全适应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需要，这也就是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阶级实质。在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蒋介石的处境已经是不妙了。在那个情况下，对于蒋介石来说，最大的需要就是时间。有了时间，蒋介石可以继续抓壮丁，继续组织部队，依靠美国人的援助，恢复他的军队，卷土重来。林彪这条路线完全是适应了蒋介石这个需要。如果辽沈战役是按照林彪的所谓建议、所谓部署来打的话，就不能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林彪在辽沈战役中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归根结蒂，就是要让敌人能继续留在东北，或让敌人全部撤向华北、华中。而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国的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就不可能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出现，也就是说战争不可能那么快结束。当然，蒋介石是必定要垮台的，但是没有三大战役的胜利，不可能垮的那么快，也就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获得全国的胜利。所以我们讲，党内的机会主义往往能够起敌人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4. 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的辽沈战役，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特别是通过战略决战就地各个歼灭敌人强大集团的经验。例如：一、关于实现毛主席的“**执行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的军事原则问题，也就是说，在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如何及时抓住有利的决战时机，坚定地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经验；二、关于在战略决战战役中如何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的经验，特别是如何实施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问题，如何使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

模的阵地战相结合的问题，如何组织连续作战的问题，如何掌握初战三原则的问题；三、关于发挥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以保证战略决战战役的必胜问题；四、如何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支援我军作战的问题，等等。但我们认为，这些经验中的最根本、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毛主席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所指出的：“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四、林彪在辽沈战役中错误路线的历史根源

介绍这个问题，主要是说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在我们党领导的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中间的关键时刻，林彪曾经多次追随“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林彪在南昌起义以后，部队在潮汕失败向江西、广东交界方向转移时，他当连长，曾经动摇逃跑过，开过小差。后来因为当时到处都是国民党白匪、土豪武装，很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彪才又回来了。

在井冈山斗争的时期，林彪曾经右倾动摇，怀疑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主席写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给林彪的一封长信。在一九四八年收进《毛泽东选集》中去的时候，把有关直接提到林彪的名字的地方去掉了。实际上，毛主席那篇文章是批评林彪的，当然也批评了其他犯错误的人。林彪在一九六九年上井冈山

时，写了一首词，胡说“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实际上就是翻这个案。

在王明路线上台以后，林彪跟着王明叫喊要搞“短促突击”，实际就是搞消极防御的阵地战。那时候很显然，我们是不能打阵地战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专搞阵地战。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批判了“短促突击”和“阵地战”，批判的对象中，也有林彪。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长征，遭到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处境十分危险。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会后，毛主席直接领导军委工作。在遵义会议以后，那样紧张的关头，当时红军正在长征的路上，林彪伙同彭德怀等要夺毛主席的兵权，要叫彭德怀去当总司令、总指挥。如果在彭德怀领导下，同志们想一想，红军长征能不能到陕北，能不能取得胜利？当然不能。

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追随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极力要打大仗，要直接配合国民党作战。实际上，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是借刀杀人，借日本鬼子的刀杀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是要刚由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新四军向日本鬼子的后方大量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不受国民党约束地开展敌后局面。而林彪却要带着主力部队去直接配合国民党部队作战，要打大仗，不去发动群众，不去建立根据地，反对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林彪在历史上关键时刻，好多次都是反对毛主席的，都是犯有主观主义路线错误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知道，日本鬼子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

日宣布投降，九月二日签定了投降书。这个时候，毛主席十分重视东北解放区的开辟。在各个解放区抽了十几万部队，和大批干部到东北去，都是主力部队，很多是老红军、老部队，战斗力都是很强的。抽了两万多干部到东北，包括十几个中央委员，到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毛主席在十二月份还发出了一个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在《毛泽东选集》上，同志们可以学习。林彪到了东北以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司令，也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和错误的军事路线。我们提供一些资料，便于同志们批判。

在政治上，林彪执行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在土改、整党中的形“左”实右的路线。比如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七日这两天，林彪就有两次电报给东北局。他说全国和平即将实现，我军要以压倒敌人的声势进入和平。他对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很欣赏的。他又说，我们现在打的仗是最后一仗。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东北停战问题的时候，林彪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实现了。一九四六年四月，毛主席要林彪破坏铁路，但林彪由于对和平存在幻想，没有破坏，结果在四平保卫战中敌人利用铁路迅速增援、补给，使我们吃了大亏。所以林彪实际上是执行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的。在土改中间，林彪对刘少奇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不要党的领导，乱杀，这样一条路线，也是很欣赏的。根据李富春同志的揭发材料，林彪十分欣赏这条路线，要推行这条路线。因此，在土改中间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利益和乱杀的现象。后来，经过毛主席的批评和纠正，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东北局会议以后才得到了纠正。

从军事上讲，林彪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消极避战，不是积极作战。林彪在东北一再强调不能打大仗。他有四

条理由：第一条是东北的敌人主力多，所以我不能打大仗；第二条是东北的铁路都控制在敌人手里，敌人转运方便，因此我不能打大仗；第三，林彪一再强调东北解放区很新，我们部队一动就走漏消息，敌人就知道，因此，我不能打大仗；第四，林彪说东北部队是凑起来的，班子是凑起来的，所以不能打大仗。林彪反反复复地强调这四点，并且根据这四点，在东北提出了三个字：等、忍、狠。他那个“等、忍”实际上就是消极避战，不去打仗；他的那个“狠”，实际上就是他在东北一贯提倡的打硬拼仗，拼消耗，也就是打阵地战。所以在辽沈战役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林彪不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可能，根据条件的逐渐改善，逐步集中更多的兵力，来消灭更多的敌人。我们举几个例子：

林彪带着部队刚进东北的时候，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月份这个时候，当时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他用了三个军从天津登陆沿着北宁线向东北前进。当时我们的一部分主力部队已到了东北。毛主席几次指示，要他在山海关和锦州之间组织战斗，林彪根本不在北宁线组织这样的战斗，拒绝毛主席的指示。林彪说：当时人民都不拥护我们，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拥护伪满。还说部队走得很疲劳，所以不能打等等。由于林彪不认真地组织这些战斗，致使敌人很快就到了沈阳。

第二个例子，一九四六年五月在四平地区，当时还是国共谈判，在东北停战的时候，毛主席告诉林彪为了使我们在谈判中间处于有利的地位，你要控制好四平，不要给敌人占领了。林彪开始坚决不愿意控制四平，怕国民党的进攻。以后主席一再指示，林彪才控制四平，可是他把七、八万部队一线摆开在一百多里路上，进行消极防御战。结果伤亡很大，四平没守住；接着搞逃跑主义，从四平到哈尔滨一枪不

放，就往哈尔滨跑。有些老首长在“九·一三”后揭发的材料里边讲到，那时部队象放羊一样，很乱。林彪甚至于要放弃哈尔滨。后来，由于主席的制止他才没放弃。

第三个例子，我们看看东北打的一些仗。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打了三次攻势，就是三个战役。夏季打了夏季攻势，秋天打了秋季攻势，冬天打了冬季攻势。在这几次攻势中消灭的敌人并不少，夏季攻势八万多人，秋季攻势近六万人，冬季攻势十五万人。但是，东北的仗有一个特点，就是消灭的敌人多数是师以下的部队和地方部队，而消灭正规军整军，在辽沈战役之前一个也没有，冬季攻势中消灭的敌人新五军，但还少了一个师。这说明有两个方面问题：一个问题，东北部队的干部战士确实能打仗，能积极主动地寻找敌人作战，消灭敌人；但另外又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林彪指挥上存在着右倾错误。其他各大野战军，都依据客观条件及时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战场上，如华东野战军战争一开始就在苏中战场上，两个月消灭敌人七个旅，后来把敌人的一整编师（就是军），两个整编师一起消灭。这样消灭敌人，对敌人打击最大，因为敌人不容易恢复。象晋冀鲁豫野战军也是这样，战争一开始，就消灭了敌人的整编第三师（就是原来的第十军），在鲁西南一仗还消灭了敌人四个军九个半旅。西北和华北也打过一些大仗。而东北野战军那几次攻势，为什么不能整军的消灭敌人呢？原因就在于林彪的指挥错误。林彪不敢集中更多的兵力打击敌人。林彪长期住在哈尔滨指挥前方作战，而把二、三个纵队集中在一个方向上，各打各的。这样，各纵队就只能积极寻求自己当面敌人作战，因此能消灭大量师以下敌人，但要消灭更多的敌人，兵力就不够了。因为要消灭敌人一个军，至少要集中五、六、七个纵队在一起，用三、四个纵队主攻敌人一个军，用三、四个纵队阻援，

才能消灭敌人一个军。此外，林彪在指挥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一仗后一定要进行大休整。所以陈赓同志在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九日，有一份电报给中央，对林彪提出了批评。陈赓在电报里边讲：目前对敌作战，必须有全国性的配合，不要你来我不来，给敌人以空隙，全国是一盘棋，应该有配合。不要我这里打了，你那个方向不打。要反对大休息。比如说，某些地区一年只发动两次攻势（指东北地区，因为东北跟其它战场不一样，其它野战军都叫什么战役，东北都叫一次攻势，两次攻势，叫秋季攻势，冬季攻势）。陈赓同志讲，如某些地区一年只发动两次攻势，其余时间都用在休整，这使敌人有机会补充，巩固阵地。他说，东北第二次攻势，战果不及第一次之大，不知是否为此原因。也就是说，林彪消极避战是原因。后来中央转发了这份电报，实际上批评了林彪，冬季攻势打得比较好，歼敌十五万人，中央转发了这份电报，是个重要原因。所以从作战指导思想上来说，林彪是消极的，是不愿积极打仗的，不愿逐步扩大歼灭战的范围的。这是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东北战场上的一个表现。

第二个方面问题，就是“六个战术原则”。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在战术思想上，表现为战争的机械论和保守主义。比如说，他的“一点两面”只讲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一点上面，完全抛开了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战场上要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于敌人，这样才能打歼灭战。而林彪的一点两面只是讲我们把部队集中在一点上。那么，如果失去了我们在战场上的优势这样一个前提，实际上就不能包围敌人，就不能歼灭敌人，可见，林彪的两面是空的，实际上是打消耗战、击溃战，是林彪战术思想的右倾、保守。林彪在东北一再强调要打硬拼仗，他说，我们用半个纵队拼掉敌人半个军，就是胜利，这和他的什么“一点两面”在战术思想上讲是

一致的。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林彪的“一点两面”、“硬拼仗”，是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歼灭战的思想的。又比如说，林彪要搞“四组一队”，实际上就是把我军行之有效的战斗编组固定化，公式化。我们知道，我们的战斗编组是要根据地形、敌情、我们部队的装备、我们部队的任务来决定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而林彪搞的“四组一队”就是把它固定下来，是军事上机械论、模式化的表现。

通过以上我们介绍的这些问题，就可以看出，林彪在辽沈战役中间的表现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告诉我们：“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它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当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的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这是毛主席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根源的揭露。就是说，凡是右倾机会主义，都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要把历史向后拉，要开倒车，脱离社会实践。辽沈战役中的林彪，就是这样一个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右倾军事思想、军事路线，是由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右倾思想决定的。他是开倒车的，是看不到形势的发展的，是脱离了战争实际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林彪和我们党内其他机会主义头子是完全一致的，一脉相承的，和孔孟之道，和历史上一切主张保守、反对革新的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也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平津战役中 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问题

根据领导的指示。要我在这里向首长和同志们介绍一下平津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介绍一下叛徒、卖国贼林彪在平津战役当中破坏和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方针和部署的罪行材料。由于个人的水平有限，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也很不足，基本上是仓促上阵，所以，介绍的内容和表达的观点很可能出现许多错误。衷心希望首长和同志们听了以后，给予批评指正。准备分四个问题介绍。

- 一、平津战役概况；
- 二、平津战役前的形势；
- 三、平津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 四、平津战役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下取得伟大胜利的。

一、平 津 战 役 概 况

平津战役是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的三大战役的最后一个战役，是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发起的。这次战役自始至终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下进行的。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就在靠近平津前线。大家知道，一九四八年五月，在西北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从西北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这样毛主席和中央就更便于直接地掌握平津战役前线的情况，和直接地指

挥平津战役。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当时毛主席指挥平津战役的指示和批复的电报，就有一百三十三份。这就充分说明这次战役完全是在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下进行的。在战役中的每一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给予指示，及时地排除了林彪的破坏和干扰，从而保证平津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

这次战役是一次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是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首先是时间长，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军包围张家口开始，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军和平解放北平结束，共两个月时间。在这两个月中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即从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包围张家口开始，到东北野战军入关切断平、津、塘沽止。这一阶段主要是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原则，抓住傅系，拖住蒋系，达到稳住敌人，不使逃脱，争取时间，以待东北主力入关完成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的目的。经过第一阶段作战，我军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孤立据点上，这就为第二阶段各个歼灭被围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个阶段，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是各个歼灭被围之敌阶段。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先后灭了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之敌，使北平之敌更加孤立，为迫使北平敌军接受和平改编、我军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条件。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至一月三十一日。这一阶段主要是政治攻势同军事攻势紧密结合，迫使北平之敌接受和平改编。

其次，战场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从东面的唐山，到西面的张家口，战线长达 500 多公里。而且敌我参战的兵力数量也是相当大的。我军是两个野战军协同作战，华北野战军两个兵团（华北二、三兵团）共 20 万人，东北野战军十二个野战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一个

铁道兵纵队共80余万人，两个野战军总兵力为100万人。当时华北敌军傅作义集团共有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四十四个师，连同一些地方保安团，总兵力为60多万人。所以说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歼灭战。

这次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先后歼灭和改编了华北敌军傅作义集团共52万余人，解放了华北的重要城市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从而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和豫北的新乡、安阳以及有意保留下来的归绥等几个孤立的据点外，其余广大地区均获解放。这就为我们尔后向全国进军，解放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家知道，我军在辽沈战役中歼灭了东北敌军卫立煌集团，解放了东北全境。我军在淮海战役中歼灭了华东敌军刘峙集团，解放了中原和华东广大地区。在平津战役中我军歼灭和改编了华北敌军傅作义集团，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这样在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敌人基本上被消灭，就使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处在我军直接威胁之下。所以，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就基本上摧毁了蒋家王朝，为我军尔后向全国进军，扫荡残敌，解放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平津战役前的形势

(一) 全国形势

辽沈战役后，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所指出的：“**敌人是正在迅速崩溃中**”。特别是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我军不仅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占有优势。在一九四八年七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国民党的总兵力为365万人，我军总兵力为280万人。到十一月二日辽沈战役结束，由于我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伟大胜利，特别是在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和北线的辽沈战役，以及西

北的澄邵、荔北等战役和华北的出击冀东、热察、绥远等行动，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四个月中，我军共歼敌一百余万，估计敌人在此期间可能补充30万，这样国民党总兵力由辽沈战役前的365万下降到290万人左右，而我军由辽沈战役前的280万人增加到300余万人。这样就使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长期占有的优势，急速地转入了劣势。正如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这篇光辉文献中所指出的：“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基于上述精辟分析，毛主席进一步得出“敌人是正在迅速崩溃中”的科学结论，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出“最后地完全地消灭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的战斗任务。

根据上述形势和任务，我军必须乘胜前进，继辽沈、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迅速发起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华北敌军傅作义集团，从而加速敌人的总崩溃，缩短战争进程，加速全国解放。而且当时敌人正在迅速崩溃，敌我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军在数量上也已占优势；同时五大解放区基本联成一片。这种大好形势对我军迅速发起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华北敌军又是十分有利的。

（二）华北战场上的形势

华北战场上的敌军傅作义集团，在华北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

以后，被迫固守点线，在战略上处于被动防御地位。

大家知道，华北我军是在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首先于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取得了清风店战役的重大胜利，歼敌第三军二万余人；尔后，乘胜于十一月六日发起石家庄战役，十一月十二日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歼敌二万余人。接着于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华北我军在北线先后进行了察绥战役和出击热察、冀东和保定以北地区，共歼敌四万余人，解放了大片地区；在南线先后进行了解放临汾和晋中战役，共歼敌十二万余人，将山西残敌压缩包围在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解放了山西全境。这样就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为了配合东北我军进行辽沈战役，华北我军西出绥远、解放了绥远广大地区，特别是切断了傅作义集团同他绥远老巢的联系。这样，就迫使傅作义龟缩在三条铁路线上固守点线。东面固守北宁线从山海关到北平之间的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塘沽、天津和北平各点；南面是固守平汉路北段保定以北各点，西面在平绥线上，即北平到绥远，主要是固守北平、宣化、张家口各点；在北平以北，主要固守承德到通县。华北敌军虽在数量上还占优势（敌军60万，华北我军40万），但在战略上是处于守势的。

特别是在东北的敌人被歼以后，华东刘峙集团正在被歼灭之际，傅作义集团就更加陷入孤立突出和无援的地位，于是预感到下一个打击目标将落在他的头上。东北野战军一百多万军队在解放东北之后，一定要进关参加解放全国的战略任务，而华北敌军必然首当其冲，它将同时承受华北和东北两大野战军的强大压力。因此，他就更加恐慌。正如毛主席当时分析华北敌军特点时指出的：“都已成惊弓之鸟”。“惊弓之鸟”这四个字，既反映出华北敌军战斗力不强的虚弱

本质，又反映了华北敌军有随时逃走的可能。

但是，由于敌人内部的矛盾重重，由于他们各自的利害关系，对于平津地区究竟是守，还是放弃撤走，是逃向长江以南，还是西窜绥远，处于一个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状态中。敌人内部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傅作义之间。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的走狗的失败，不愿轻易放弃他侵略中国所得的利益，同时考虑到放弃华北，江南也难保，所以美帝国主义主张坚守平津。它企图以傅作义集团牵制我东北和华北两大野战军，以便它支持蒋介石在江南重整军力，卷土重来。为了稳住傅作义坚守平津，美帝国主义答应直接向傅作义提供美援，提供军事装备。于是赶运了七万支卡宾枪，两亿发枪、炮弹，直接交给傅作义，以改善其装备，使他定下坚守平津的决心。蒋介石在其东北卫立煌集团已经被歼、华东刘峙集团正在被歼之际，开始想把傅作义集团撤到江南，加强长江防线，以便防卫他反动统治的老巢京、沪地区。为了实现他的打算，用封官许愿的办法，引诱傅作义南下。说傅作义如果南下的话，他可以委任傅为东南行政长官。但是后来蒋介石又有所变化。其中主要原因是他看到美帝国主义不让放弃平津，如果他违背了美帝国主义的意旨的话，那么，美帝国主义很可能在军援上卡他。再一点，就是傅作义不肯南撤，因为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第三点就是他考虑四十四个师的兵力从海上撤，没有足够的海上运输力量，美国人不同意放弃平津，也不会给他海上支援；从陆上撤，他势必要经过华东、中原两大解放区，有我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堵截，也很难实现。因此，他想在必要时牺牲傅作义集团，以换取时间，掩护他重整军力，加强长江防线。于是他又改以傅作义集团暂时留守平津。然而傅作义有他的打算。他的基本打算是西窜绥远，同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

集团，相互依托，负隅顽抗。他所以不想南逃，一是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怕撤到江南被蒋介石吞并了；二是因为他的部队多是绥远人，在当时形势下撤向江南很困难。基于上述考虑，他不想南撤，想要西逃。但他也有个变化过程。他想马上西窜绥远也很困难。第一，美帝国主义要他坚守平津，如果他强行撤向绥远的话，美帝国主义就会断绝援助；第二是蒋介石不让他西窜，而当时蒋介石在平津一带有二十四个师的力量，他自己只有二十个师。他想拔腿就走，蒋介石会不会让他走，也是个问题。第三，是傅作义当时有个错误的判断，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敌人对于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傅作义当时估计东北野战军经过辽沈战役之后，要想入关作战至少要三个月甚至于半年时间休整。而且，当时的东北主力由于辽沈战役后期大部集结在沈阳、辽阳、营口这一线，从这里向关内行动，需要二十天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他判断，东北野战军不会马上入关。在这个时间内，他可以继续扩充实力。他搞了两期扩军计划，第一期扩军计划以三个月为期扩军二十万，第二期又以三个月为期扩军三十万。加上他原有的六十万人，到半年之后他就有百、八十万了。他估计我东北野战军入关以后，加上华北野战军也就是百、八十万。由于他有这样一个判断，再加上美、蒋等牵制因素，因此，想以暂时坚守平津，来捞取美援，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再向绥远跑。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傅作义各有各的打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上旬蒋介石和傅作义在南京举行了一个军事会议，专门就平津地区防务问题作了研究。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之后，初步确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这样一个方针。所谓保持海口，一是必要时准备南逃，二是接受美援。所谓以观时

变，一是看整个世界形势变化（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积极活动美、英、法、苏四国出面干涉中国革命）；二是看东北野战军什么时候入关。因此，我们说敌人的这个方针仍然是一个观察形势，准备逃跑的方针。根据这样一个方针，蒋介石要傅作义调整部署，收缩兵力，把主力集中在平、津、唐山三角地区，就是要傅作义把兵力集中在东面，放弃西面。蒋介石的这个部署，用意十分清楚，就是当我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傅作义支持不住的时候，准备依托塘沽海口，暂时组成防御来顶住我军，尔后逐步地把部队从海上南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他准备南撤的意图。但是傅作义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办，他只把承德和秦皇岛、山海关的蒋系13军和86军收缩到平津地区，把蒋介石的24个师部署在北平、天津、唐山这个三角地带，而把他自己的二十个师部署在北平、张家口之间。从傅作义的这个部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还是企图保持西窜绥远的通路。根据这样的部署，他就把部队配置在新划的三个防区：一个是张家口防区，以张家口为中心，包括张北、万泉、宣化、怀安这一线，这是傅系十一兵团，一个兵团部、一个军、七个师旅；第二是北平防区，一个总部、两个兵团部、六个军、20个师；第三是津、沽防区，主要是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和第十七兵团共五个军、17个师。这样就在东起唐山西到张家口五百公里的狭长地上，形成了一个固守点线的一字长蛇阵。为我军对其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上面的全国形势和华北战场上的形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客观形势要求我们迅速发起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华北敌军。因为敌人既是惊弓之鸟就可能跑，而且它跑到那里都对迅速解放全国不利，只有将其就地歼灭，才能加速敌人的崩溃，才能缩短战争进

程。所以，迅速发起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华北敌军，这是当时全国和华北战场上的形势向我军提出的战略任务。

二、全国和华北战场上的形势又对我军迅速发起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华北敌军十分有利。首先全国形势对我有利，敌人正在迅速崩溃中；其次我军经过辽沈战役取得了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第三，全国五大解放区基本上联成一片，特别是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有充分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解放平津的作战；第四，华北敌人是惊弓之鸟，没有什么战斗力，特别是处于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状态中，这就给我机动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主力对其实施包围分割以有利时机。所以我们说：在辽沈、淮海战役之后迅速发起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华北敌军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根据当时全国和华北战场上的有利形势，及时地定下了东北主力早日入关、就地歼灭华北敌军的英明的战略决策。

三、平津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平津战役中，林彪继续破坏和干扰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战略部署。两条军事路线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 在东北野战军入关时间问题上，林彪破坏毛主席就地歼灭华北敌军的战略决策。

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上、中旬，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华北战场的形势，数次对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作了指示。毛主席和军委当时发出的电报指示的基本精神是：1、傅作义集团是全国敌军当中唯一可以机动的战略集团。当时敌

人尚有四个战略集团：其中华东的刘峙集团正在被歼；西北的胡宗南集团正在被我西北野战军所牵制，同时他要掩护大西南，否则云贵州的门户就开放了；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主要在武汉扼守长江中游，如果他要机动，中南的大门就打开了，使我军有可能从华中迂回到华东，特别是南京、上海的侧后，所以他也不能动，唯一可以机动的是傅作义集团。而且当时傅作义集团要跑的话，依华北我军力量当时还难于阻止其逃走。同时他有南逃或西窜的企图，所以说傅作义集团是敌人尚存的四个战略集团中的唯一可以机动的集团。2、对于这个集团的动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坚守平津，二是全部南逃，三是蒋系的24个师南逃，傅系的20个师西窜绥远。这三种可能，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认为，以敌固守平津对我们最为有利。毛主席和军委指出：从全局看，抑留蒋系24个师和傅系20个师于华北就地歼灭，一则有利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如敌南逃、西窜我虽不战而得平津，但对未来战局不利。3、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在分析华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之后指出：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就地歼灭，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当时华北野战军有三个兵团，尚有一个兵团（第一兵团）包围太原，能用于平津作战的就是第二、第三兵团。如果傅系20个师西窜绥远，我华北两个兵团亦无把握阻止其西窜，难于截歼其主力；如果蒋系24个师集中于津、沽一带，逐步由海上南撤，我华北两个兵团亦无法破坏其计划。况且傅系西窜，蒋系必同时南撤，使我两头失塌。因此要就地歼灭华北敌军，只有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基于上述情况，毛主席和军委及时决定东北主力在辽沈战役后，不待休整，迅速入关，完成战略包围，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由此可见，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就成为就地歼灭华北敌军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为了使

东北主力早日入关，毛主席和军委先后五次发出指示。这里我把毛主席先后发的电报以及林彪破坏干扰的情况介绍一下。

毛主席早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前，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就指示林彪，要他以当时在锦州以西的四纵队和十一纵队先行入关，作为东北野战军入关的先遣部队。随后，毛主席在十月三十一日再次指示林彪，要他在精神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做好入关的准备。主席在电报中指出：“中央九月会议规定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此点你们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并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同时，主席在电报中还指出“争取于一个月内外，修通沈锦线，彰武、义县、承德线铁路，整理热河及冀东境内各主要公路以利军运并迅速运屯粮弹，否则将无法供应大军作战”。林彪对毛主席这些英明指示，置若罔闻，毫无反映，根本不做任何准备。因此，毛主席在十一月十六日又电示林彪：“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从这个电报里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要东北主力早日入关，既考虑到战略形势的需要；又考虑到东北部队的实际情况。因为东北部队完成了辽沈战役这样一个大的歼灭战，要执行下一个战略决战任务，需要休整和补充。但如果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于东北进行休整尔后入关，则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敌人随时都可能跑掉，而华北我军现有兵力又不足以阻止其逃跑。所以只有东北野战军早日入关，完成对敌人的包围分割，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我们可在准备好了之后，从容攻击。因此，毛主席指示林彪要东北主力早日入关，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包围，在包围姿态下休整部队。十一月十七日，军委又指示林彪，具体地提出要东北野战军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左

右开始向关内开动。但是就在十一月十七日当天，林彪在致军委的复电中却说：“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并且制造了借口说：“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同时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尚未发下。”这完全是借口。以此反对毛主席关于东北主力早日入关的指示。针对林彪按兵不动，不想入关，毛主席在十一月十八日严令林彪：“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在毛主席和中央这样三令五申，严令督促下，林彪才于十一月十九日九时半致电中央勉强表示同意部署东北主力入关。但是，他仍继续干扰，十一月二十日他又给军委发了个电报，要求推迟一天出动，也就是在二十三日出动。他在电报中说：“如二十二号出发，则实在太仓促，全军皆无法进行起码的政治动员，因此出发时间可否改在二十三号”。毛主席要他二十一日、最晚二十二日出动，他要二十三日出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反对毛主席战略方针是处心积虑的。从十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向他发出预先的指示，要他做好入关的精神、组织、物质准备开始，到十九日他勉强同意部署东北部队入关止，耽误了整整二十天时间。使部队入关动员、准备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我们从当时部队的一些报告中可以看出，部队在出发时，是非常仓促的。有的部队就是经过简单动员马上出动，而有的部队则在行动后才进行动员。这些都是林彪按兵不动，拖延时间，拒绝执行毛主席关于东北主力早日入关的指示，进行种种破坏、干扰所造成的。

林彪在反对东北主力早日入关问题上所制造的三个借口是根本站

不住脚的。他的第一个借口是：东北的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干部也滋长了享乐情绪。这对当时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积极要求入关的革命积极性是一个极大的诬蔑。在他看来，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革命的利益，是些目光短浅，只知“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的“小人”，根本没有什么远大的革命目标。这和孔老二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完全是一个腔调。事实上，当时东北野战军的广大指战员在战略决战的大好形势鼓舞下，积极要求入关，革命积极性和政治觉悟是很高的。我们用这样两个事实就足以驳倒林彪的借口：

1. 我们从部队提前到达平津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包围，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东北我军广大指战员政治觉悟是很高的。部队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先后由东北出发，经过半个月到二十天的连续行军，不顾疲劳，行程一千五百多华里，于十二月二十日前全部到达平津前线，对敌人完成分割包围，比中央原来预计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提前了五天左右时间。尽管由于林彪的破坏干扰，部队入关的动员、准备很仓促，但由于广大指战员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士气高涨、斗志昂扬，所以比预定时间提前到达平津前线。不仅部队如此，当时东北解放区的广大人民也是积极支援我军入关。随军入关的民工就有十五万人。这些都充分证明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革命积极性和政治觉悟是很高的。
2. 我们从东北野战军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向中央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林彪所制造的借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报告中说：“部队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出发，经一个月全部到达冀东地区，因沿途粮草准备较好，故给养未感困难，又系胜利形势下进军，故士气亦甚饱满，到达后未及休整即进入战斗。”这就有力戳穿了林彪的谎言。

从林彪制造的第二个借口，就是新兵和俘虏战士的补充和争取工作要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根据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东北野战军给中央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在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总共补充了17万新兵。其中解放战士11万人，翻身农民6万人，占东北野战军入关总兵力80万的21%。虽然部队增加了大量的新成分，而且由于林彪破坏干扰，动员教育工作不足，但在胜利形势鼓舞下，部队士气很高，经过半月到二十多天的长途行军，到达平津前线，非战斗减员仅占入关总人数的百分之1.4%。从这个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并没有发生象林彪所估计那样严重逃亡和减员情况。事实有力地驳倒林彪的借口。

林彪制造的第三个借口，就是说部队的棉鞋、棉帽、冬大衣未发下来。当时，由于部队在辽沈战役中连续作战，虽有部分部队大衣、棉鞋、棉帽未发下，但这并不构成部队入关行动的不可克服的困难。根据当时东北野战军和东北解放区的运输条件和运输力量是完全可以在部队开进中迅速加以补充的。首先在运输条件上，东北解放区较之其他解放区都好。在部队向关内开进路上，有两条铁路可供利用：一条是北宁线，一条是彰武、义县、承德线。北宁线在辽沈战役过程中虽有破坏，但东北野战军它有一个比较强大的铁道兵纵队，这是其他野战军所没有的，再加上动员地方上铁路员工，完全有力量迅速修复的。事实上也是很快就修通了。我们从李富春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东北部队出动的当天给中央的报告中可以得到证明。李富春同志的报告中说：“锦榆段铁路现正抢修到兴城，月底可到山海关。部队入关后，可继续以二个支队向关内修。现在由哈尔滨、通辽、彰武、新立屯至锦州线已通，从沈阳经新立屯线本月底可通。只要不被敌机轰炸破坏，每日开四个到六个列车（每列车25个到30个车

皮，每个车皮载重30吨）到锦、榆线无问题。现正在着手计划争取从营口、葫芦岛及大连组织海运的可能作为辅助。”由此可见，到十一月底，从东北哈尔滨直到山海关铁路运输是畅通的；而彰武、义县至承德线因多在解放区内故未受什么破坏。此外还有公路。所以我们说运输条件是很好的，完全可以保证向前运送部队急需给养被服。第二，在运输力量上也是有保证的。除了铁路每日可以向前发4—6个列车，100—180个车皮，3000至5400吨物资外，汽车和骡马大车以及人力运输力量也是很强的。根据李富春同志十一月二十三日报告：当时有汽车3000辆（含野后三个运输团1000余辆汽车和动员地方汽车2000辆），大车8000辆，牲畜14万匹（包括部队10万匹），15万民工。此外，华北冀东解放区也动员5000辆大车随军行动。所以我们说在运输力量上完全可以保证其部队开进中的补给需要。事实上，从部队出发到抵达平津前线过程中，从东北向锦、榆地区运送给养达500个车皮，弹药器材420个车皮，油料三万大桶。不仅棉帽、棉鞋和大衣迅速补给到部队，而且连作战需要的数万件血衣血被也运到前线。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林彪制造的借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说，林彪所谓的“困难”是假的，是借口；实质是按兵不动，不想入关，拖延时间。这就可能放跑敌人，破坏毛主席关于就地歼灭华北敌军的战略决策。

(二) 在东北野战军入关的行军路线问题上，林彪破坏毛主席关于稳住华北敌人的战略部署。

东北野战军早日入关是就地歼灭华北敌军的一个决定性条件。但东北野战军要入关需要一个行军时间。中央当时估计东北野战军到达平津前线完成包围敌人的部署需要二十天到一个月时间。因为从辽西、沈阳、营口、辽东向华北前线机动，路程有一千五百多华里。在此期间内，能否稳住傅作义集团不使其逃跑，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战略部署。首先，毛主席指示东北野战军要荫蔽行动，秘密入关，不走山海关，以免被敌人过早发觉而促使其下决心逃跑。同时，毛主席令华北一兵团（徐向前、周士第兵团）缓攻太原，以免刺激傅作义下决心逃跑；令华北三兵团，撤围归绥，集中于集宁附近地区；令华北第七纵队对保定的敌人采取监视，不要歼灭；并指示华北我军利用傅作义玩弄与我们谈判的缓兵之计来稳住敌人。十二月上旬又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在两周之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这样，稳住蒋介石使其不过早地下决心从海上撤走平津之敌。在这一系列稳住敌人的部署中，东北野战军荫蔽行动，秘密入关，不要走山海关，不使敌人过早发现东北野战军入关行动，是稳住敌人的首要措施。为了荫蔽我东北野战军早日入关的战略企图，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指示林彪说，“傅、蒋在山海关的一个军尚未撤退，其目的是估计你们主力入关必走该地，让该部先挡一挡，争取主力逃跑或固守之余裕时间。因此，你们主力入关应取四纵、十一纵所走道路，不要走山海关。”（这两个纵队入关是走的冷口、喜峰口）而且，毛主席明确指示，“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同时，毛主席还指示东北局令东北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在两周内多发东北部队在辽西、沈阳、辽东等地祝捷、庆功和练兵等活动消息，以迷惑敌人。十一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又电示林彪：“你们可以位于锦州、打（大）虎山、营口等地之五个纵队于二十三日出发，取捷径夜行晓宿隐蔽迅速行进。”“各部均走热河境内出冀东，不走山海关。沈阳地区各部及总部大行李则应缓若干天出发，走山海关附近出唐山。如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决定先走，则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队均应注意

隐蔽。”二十四日毛主席又指示说，“你们后尾部队和总部亦不要走山海关。”主席连续三次指示他，不要走山海关，部队要隐蔽行动，但是林彪置若罔闻，并且采取先斩后奏的卑劣手法，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擅自命令后尾三个军，即39军、44军和49军经山海关入关。尔后于十二月七日他才向军委报告，并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讲：由于山海关以北山地，平泉到遵化的路上人烟稀少，所过部队太多，同时我们大量军队经长途行军南下，敌每日夜均有飞机侦查，已无秘密可言。昨已令后三个军经山海关前进。在这里林彪制造了两个借口：一个借口是说走冷口、喜峰口，从热河出冀东的路线，人烟稀少，部队过得又多，意思就是说部队吃的、住的都成问题。这个借口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大家知道，冀、热、辽是个老解放区，人民条件很好，对我军秘密行动、保守机密来讲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至于吃的也不成问题。我们从李富春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中可以得到证明，李富春同志在电报中讲：我们正准备于二十日后开始运第二战役（即平津战役）物资，因部队行动在即，除急电热河、冀东加紧准备粮草外（冀东有可维持一百万人、十万匹牲口的二个月的粮料），东北准备的物资待部队行动后赶运（已运到彰武、义县、新立屯的不计）。为了保证沿途部队供应，由热河军区组成后勤第六分部，并由东北解放区拨五十万银洋作为过境部队临时开支之用。在冀东解放区组织了34个供应站，有供百万大军食用两个月的粮食。所以，从热河境内出冀东，吃的，住的都不存在严重困难。事实上，先后从这里经过的九个纵队，基本上没有在供应上发生大的困难。东北野战军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沿途粮草准备较好，给养未感困难。”可见林彪借口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借口，是说我们这么大的军队，长途行军南下，没有什么

秘密可言。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上大的战略行动保守机密成功的事例很多，就以我军来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指挥的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在敌情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我军都是在敌人相离二十里到四十里之间穿插行动，没有被敌人发现。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我们从东面回师兴国的时候，从几部敌人四十里空隙之间回到兴国休整半个月之后敌人才发觉。在那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在毛主席指挥下都可以作到这一点，何况东北我军入关经过的路线是在老解放区，更有利于保守机密。就以这次东北我军向关内开进，也有效地保守了秘密。由于我军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指示采取夜行晓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敌人没有发现我军行动。傅作义是在十二月五日发现我第3、5纵队出现在长城线上，但他并不认为我东北主力入关。傅作义发觉我东北主力入关是在十二月十二日，这时我军已在平张线上将其基本部队分割包围起来，他想跑已来不及了。在东北主力到达平津前线之前，关键的问题是稳住敌人，为了稳住敌人，毛主席要东北部队秘密行动，不走山海关，而林彪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和重要措施上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擅自决定后尾三个军走山海关，实质是暴露我军入关的战略企图。这就可能把敌人吓跑。如果不是毛主席已令华北二、三兵团和东北二兵团在平张线上将傅系基本部队分割包围起来，把傅作义注意力吸引到西面，必将造成严重恶果。

(三) 在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行动问题上，林彪破坏毛主席关于“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

对东北主力入关以后的行动和任务，毛主席早在东北部队入关以前就作了明确指示。毛主席在十一月十六日电报指示中，要东北主力

进关以后，包围天津、塘沽、唐山。在十八日电报里也指示，要部队进关以后突然包围天津、塘沽、唐山敌人，切断敌人海上逃路。十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又指示，东北主力入关以后，第一个作战任务是在平津线上的廊坊，切断北平和天津的联系；第二个作战任务是歼击芦台和塘沽的敌人，封闭敌人海上的逃路。但是林彪拒不执行毛主席要他切断平津联系的指示，而且要用先到的第三、第五纵队去打南口的十六军。林彪在十二月七日向军委发了一个电报，说：“为保证确实歼灭傅作义全部及南口之十六军，我们意见以先到之第三、第五两个纵队立即经平谷与顺义附近，以五、六天行程插到南口附近，参加作战。”对林彪的这个错误主张，毛主席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七时电令林彪，不要以三、五纵队打南口的十六军。毛主席指出：“你们想以第三、第五两纵队去打十六军，在全盘计划上是不妥的。”为什么不妥？毛主席在电报指示中讲得十分清楚，就是傅作义有十四个师，一个骑兵师集中在北平、涿县、通县、顺义、南口地区，在平津尚未隔断的条件，如果除了程黄兵团（即东北二兵团）已用于康庄八达岭一线，再用两个纵队去打南口的十六军，那就有迫使南口以东北平地区的十五个师早日逃向天津、塘沽的危险。同时，毛主席再次指示林彪“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不使这些敌人逃至天津。其方法是以四纵队占廊坊、香河之线，隔断平津联系。只要此着成功，则北平敌15个师无法逃脱。”并指出：“敌人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最后要他“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之计划。”

但是林彪拒不执行毛主席上述指示，竟于十二月十日十八时在致军委的电报中说：“已令三、五纵队全力向南口前进。抓住南口之敌和防止平敌北援，……已令十纵先头师自玉田以东向北平急进，截断

十三军，佯攻北平。”再一次用先斩后奏的手法继续坚持其错误主张。对此，毛主席于十二月十一日九时急电制止，严令“三纵不应去南口”，并说“理由详另电”。可见当时情况之紧迫。在毛主席严令制止下林彪才放弃以三、五纵队打南口十六军的错误主张。

毛主席在上述指示的同一天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进一步向林彪作了指示。这就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毛主席在这一指示中，首先针对林彪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出：敌人除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这就打中林彪的要害。林彪为什么顽固地坚持要第三、第五两纵队打南口的十六军而不去执行切断平津的任务呢？根子就在于他过高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怕以三、五纵队执行切断平津任务会受到平津之敌夹击。其实当时敌人是惊弓之鸟，既没有夹击我军的胆量，又无形成夹击的力量。因为这时，傅作义的十一兵团 105 军已被我华北三兵团包围在张家口。他的所谓“精锐”部队 35 军已被我华北二兵团包围在新保安。而怀来、康庄的 104 军和 16 军正在被我东北二兵团追歼中。傅作义为了解救其被围部队和加强北平防御力量，又把天津和塘沽附近的 92、94、62 三个军调到北平以西。这样天津、塘沽、唐山地区只有 86、87 两个军。在这样情况下，北平之敌已被吸引向西或防守北平。天津、塘沽敌人兵力有限，根本无力出击。所以林彪不敢切断平津，完全是他畏敌如虎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反映。而且当时也具备切断平津的条件。首先在时间上，林彪要三、五纵队以五至六天行程插到南口打 16 军；那么以五至六天行程同样可以插到廊坊、香河之线，完成切断平津联系。从蓟县、玉田到南口是 136 至 176 公里。而从蓟县、玉田到廊坊只

有82至100公里。由此可见，从蓟县、玉田到廊坊比到南口还近。其次在兵力上，除第三、第五纵队（已到蓟县、玉田）外，第六、第十纵和华北七纵均可用于执行切断平津任务。十纵先头师于十二月七日已到玉田附近。六纵已达喜峰口。事实上，后来第三、第六、第十纵队执行切断平津任务时，三纵是十二月十三日到达北平以南马驹桥、青云店，十纵于十二月十三日到达廊坊，六纵于十二月十五日到达香河。事实证明，当时完全有时间、有力量完成对平津的切断。事实还证明，在我东北野战军第三、六、十纵向廊坊、香河之线实施隔断时，北平和天津敌人并没有出来夹击我军。这就充分证明，林彪过高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不敢切断平津联系，是个畏敌如虎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为了稳住敌人，争取时间，以待东北主力到达平津前线对敌完成分割包围的部署，毛主席在战役发起前就明确指示部队要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的方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指示华北三兵团：“迅速向东包围张家口，……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攻击。”十一月二十七日又指示部队迅速抓住并包围张、宣之敌，“吸引敌人向西增援”。二十九日指示部队，“在包围张、宣之敌后，做好阻击工事，……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十二月一日又指示部队：“务必包围几部敌人，以便调动东面敌人西援。敌不重在歼灭，不重在包围。”到十二月十一日毛主席进一步指示：“从本日起一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有些则是隔而不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从上述一系列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方针计划就是包围张、宣之敌，抓住傅系，拖住蒋系，调动平津之敌向西增援，尔后加以分割包围，使敌难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正是由于我军

执行毛主席上述方针计划，所以调动北平敌人两个军（35军、16军）增援张家口和康庄，调动了天津、塘沽附近敌人三个军（92、94、62军）到北平。从而稳住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为东北主力完成隔断平津，包围津、塘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林彪以先到之第三、第五纵队打南口敌16军正是破坏毛主席的这一全盘计划的。因为毛主席是尽量把平津敌人向西调，而林彪则拼命想把南口以东的敌人向东赶到天津、塘沽。所以我们说他以三、五两纵队打南口敌16军就可能把北平之敌赶跑，破坏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全盘计划的。

从林彪这一极端错误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没有全局观念，二没有歼灭战思想。他是哪里好打，打哪里；打了这一步不管下一步。根本不看对全局的影响，根本不计后果。他不敢切断平津联系，不敢打歼灭战，只想把敌人赶走完事。

从上述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看法：

1. 在平津战役中林彪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破坏、干扰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计划和部署。譬如，东北主力早日入关是保证就地歼灭华北敌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条件。而林彪正是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英明的战略决策。又如为了稳住敌人，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东北野战军隐蔽行动，不走山海关，不让敌人过早发现我们的战略企图。而林彪又是在这样关键问题和重要措施上反对秘密行动，擅自令他后尾三个纵队走山海关，破坏毛主席关于稳住敌人的战略部署。再如用三、五纵队打南口问题，毛主席当时的方针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调动敌人向西，而他硬要赶敌人向东。这些都是关键问题。林彪在平津战役中所进行的干扰和破坏，虽然在时间和问题范围以及表现形式上，与辽沈战役有所不同，但就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干扰、破坏

毛主席关于就地歼灭敌人的战略决策。

2. 林彪在平津战役中的三个问题，核心是可能导致敌人跑掉。他按兵不动，拖延入关时间，就可能放跑敌人；他反对荫蔽行动，擅自令后尾部队走山海关，就可能吓跑敌人；他以三、五纵队打南口，就可能赶跑敌人。这样就不能就地歼灭华北敌军，不能加速国民党反动统治总崩溃，不能尽快解放全国，不能尽快实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就必将阻碍历史车轮的前进。当时，形势要求我们迅速就地歼灭华北敌军，而林彪按兵不动，实际上是延长敌人寿命，推迟全国解放。这正适应敌人的需要，起到了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作用。这同两千年前的孔老二搞“克己复礼”，阻碍历史车轮前进实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个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

3. 林彪在平津战役中的三个问题，是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林彪是一贯右倾的，在革命低潮时，表现悲观动摇；在革命高潮时，表现为消极保守，畏缩不前。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南昌起义以后，他开小差。在井冈山时，他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反对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在辽沈、平津战役这样战略决战的大好形势下，表现为右倾保守，畏缩不前。他总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错误地估计形势，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过低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总是否定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相信革命群众的力量；总是片面地强调困难，不看有利条件；总是只看局部没有全局观念。这些都是他右倾机会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反映。

四、平津战役是在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下取得伟大胜利的

第一，毛主席抓住继续进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毅然发起平津战役。

毛主席根据敌人正在迅速崩溃的有利形势和华北敌人是一个“惊弓之鸟”，有可能跑，但又处于举棋不定的大好时机，及时地定下了迅速发起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华北敌军的英明战略决策。并且排除了林彪的破坏干扰，保证了这一战略决策圆满实现，取得了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余人重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这就为我军向全国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如毛主席当时指出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现在距离解放军攻克济南只有四个多月，距离攻克沈阳只有三个多月，但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却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北线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线的淮海战役期间，这三个战役使国民党在去年十月初至今年一月底的不足四个月中丧失约一百五十四万多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整师。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三大战役后，敌人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蒋介石被迫“引退”，国民党政府逃向广州。在军事上敌人从新疆到台湾的漫长战线只有一百多万作战部队，而且士气低落，处于土崩瓦解状态。这样就缩短了战争进程，加速了全国解放。这些都是毛主席及时定下战略决战的英明决策的光辉结果。

第二，毛主席在战役前和战役发起时，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

针。

为了拖住华北敌人，不使逃脱，以待东北主力入关迅速完成对敌人的包围分割部署。因此，毛主席决定首先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的方针。战役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无比正确的。由于我军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一方针，首先对平张线上傅系各部采取“围而不打”的原则，突然包围张家口之敌，调动平、津之敌向西增援，尔后又将其增援的35军、16军分别包围在新保安和康庄等地。这样就使傅作义对张家口、新保安被围部队难于弃置不顾，难于下从海上南逃的决心，迫使他继续调动天津、塘沽之92、94、62军增援北平。从而达到了拖住敌人，不使逃脱，争取时间，为东北主力入关完成分割包围的部署创造了条件，使敌人陷于逃不掉、收不拢的绝境，为尔后各个歼敌创造了条件。

第三，毛主席正确地决定了先从平张线打起的攻击次序，抓住傅系，拖住蒋系。

毛主席根据当时华北战场上敌、我情况，决定战役首先在平张线打起。抓住傅系，拖住蒋系，断敌西窜逃路，攻其必救，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原则，调动敌人向西，减少敌人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毛主席所以选定在平张线上打起，首先包围张家口，因为：一、张家口是敌人三个防区的薄弱部分，是傅系部队。敌人在这里只有七个师旅的兵力，我以华北三兵团可以完成对该敌的包围。二、平张线特别是张家口又是傅作义准备西窜绥远的要道。所以，只要我军分割包围平张线傅系各部，傅作义必以其平、津部队前来救援。从而达到抓住傅系，拖住蒋系，调动敌人向西，为东北主力入关完成分割包围部署创造条件。三、我军向平张线机动比较方便。当时华北二兵团在阜平、曲阳地区，东北二兵团在蔚县、平谷地区。这两个兵团向

平张线机动比较方便。因此，毛主席决定战役首先于平张线打起，攻其薄弱的和必救的部位，因而拖住了敌人，争取了时间，完成了分割包围的部署，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孤立据点，为各个歼灭被围之敌创造了条件。

第四，毛主席把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紧密结合起来，创造了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创造了解决残敌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天津方式就是在敌人拒绝放下武器和接受我军条件的情况下，用战争形式把它消灭。北平方式就是在我军强大压力之下，迫使敌人接受我军的条件，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就是在我军为了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主要集团的情况下，有意地保留一部敌人，以便我们歼灭了敌人的主要集团以后，再以和平改编的方式改编。这三种方式，对于解决残敌、加速全国解放具有重大意义。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毛主席又讲：“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

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三种方式就给残余敌人指明了出路；如果顽抗到底，就象天津陈长捷那样被歼灭；如果放下武器接受我军条件，就可以站到人民方面来，就象傅作义那样。这对瓦解敌人起了重大作用。后来我军向全国进军时，湖南的、云南的、四川的和新疆的敌人不少是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 * *

从以上介绍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平津战役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的结果，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果，是我们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在华北、东北解放区广大人民支援下取得的。平津战役和淮海、辽沈战役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也正因为它在历史上占有这样一个重要地位，所以林彪和他的死党就极力掩盖他们在平津战役和辽沈战役中所犯下的罪行，极力歪曲历史，美化林彪，说这两大战役是林彪“首先发动”的，“直接指挥的”，为林彪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这两大战役的真实面貌来戳穿他们的阴谋，剥掉他所谓的“天才的军事家”、“非凡的统帅”、“常胜将军”的画皮。对他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

一九七四年七月